我写情诗打广告行销海外，我是唐代长沙窑

□ 张海军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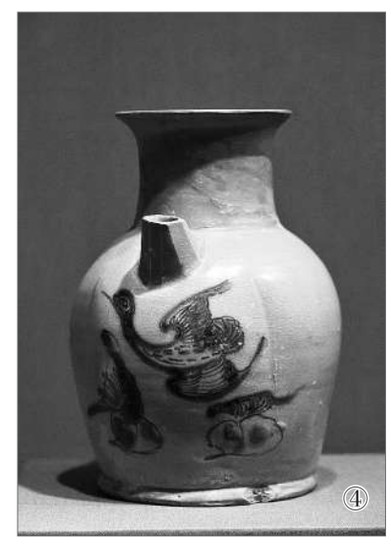
“男儿爱花心，徒劳费心力。有钱则见面，无钱不相识。”

……

这些颇有汉魏之风的诗歌，并不收录于古代诗集，而是出现在唐代瓷器上。千年前的长沙窑，以瓷器为诗歌载体，为实用器赋予了“文创”色彩。长沙窑不仅写诗，还打广告，卞家的碗写“卞家小口天下第一”，许家的瓶写“许家绝上一升茶瓶好”。唐代的瓷器市场，商战风起云涌。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湘江东岸铜官镇瓦渣坪一带，又称“长沙铜官窑”，其兴起于“安史之乱”后的8世纪中后期，鼎盛于中晚唐，衰落于五代。

长沙窑融合南北陶瓷烧造技术，首创瓷器釉下多彩工艺，并广泛地将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用于瓷器装饰，开创了中国古代瓷器装饰新风尚，奠定了唐代“南青北白长沙彩”瓷业局面，产品行销海内外，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①唐代长沙窑瓷，上书“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②唐代长沙窑青釉褐绿彩瓷盘。

③“黑石号”沉船模型。沉船共计打捞6万多件唐代瓷器，其中长沙窑瓷器达5.6万余件。

④唐代长沙窑青釉卢雁纹瓷执壶。

（本版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瓷器上的“市民文学”

长沙窑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表明，长沙窑窑区主要分布于湘江东岸石渚湖至铜官镇南北5公里区域内，生产规模宏大。长沙窑制瓷原料就地取材，采用卧式龙窑烧制。瓷器造型丰富，品类齐全，装饰以彩绘、书法、贴花、贴塑为主要特点。长沙窑是中国目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唐代窑址，已辟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以诗饰瓷”是长沙窑窑工的创造。目前已发现的长沙窑瓷上的诗作有100余首，绝大多数不见于《全唐诗》，并多创作于唐代。这些诗是对生活艺术的提炼，是今天的我们观照唐代生活的一面镜子。

诗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面很广，有酒诗、情诗、离别诗等。这些诗歌往往情感真挚动人，风格朴素自然。有的抒发离愁别恨，有的描写男欢女爱，如“自从君去后，常守旧时心。洛阳来路远，凡用几黄金”“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等。

还有反映世态炎凉、伦理道德、饮宴应酬、描写风景以及求学的诗歌，如“孤竹生南岭，安根本自危。每蒙东日照，常恐北风吹”“凡人莫偷盗，行坐饱酒食。不用说东西，汝亦自涤直”“二月春丰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住在绿池边，朝朝学采莲。水深偏责就，莲动更移舡”“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这些诗歌是人们对现状的哀鸣，是对盛唐的回味，是情感的真挚流露，也是市民文学的雏形，有着较高的文学艺术性。

除诗歌外，长沙窑瓷上还有不少短句。有的是古训，长期流传于民间，书于瓷上，对使用者而言，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如“仁义礼智信”，是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时人们须遵守的礼教；如“慈乌反哺之念”“羊申跪乳之志”“牛怀舐犊之恩”等，是教人孝敬父母，对父母常怀感恩之心；如荀子的“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指出人们择友若出于正直之人的环境中，自然也会正直善良。

长沙窑瓷中还有生活实用哲理的描述，如“罗网之鸟，悔不高飞”“悬钓之鱼，悔不忍饥”，告诫人们做人不能贪图蝇头小利，否则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乃至性命不保。这些古训、谚语言词简洁，寓意深刻，是对唐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天下第一”“天下有名”长沙窑瓷是怎么打广告的

在长沙窑瓷上的长短句中，我们能感受到商品经济发展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如“有钱水亦热，无钱火亦寒”，表明金钱已成为人际关系的重要参与者。

长沙窑是面向市场的民间窑场，特别注重产品的宣传和推广，部分瓷器上题有广告词语。根据已公布的长沙窑瓷来看，其内容有作坊铭记、产品赞美、价格标识和为其他产品代言等。

作坊名是长沙窑瓷上运用的商业广告题材最多的一类。起初是作为官府作坊“物勒工名”的管理手段，后来被长沙窑工匠转变为商业广告品牌或商标，如“何”“年家”“刘”“成”“郭家”“庞家”“张”“康”“龙”“赵家注子”“张注子”等，近30个。这些商家号或作坊号，实际上都是为其产品所作的品牌广告。

产品赞美也是广告内容之一，主因是长沙窑各作坊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故为了争取客户，便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夸张宣传，以期扩大销售，如“绝上”“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龙上”“张上”“许家绝上一升茶瓶好”等。

价格标识是长沙窑的特色之一。长沙窑工匠将价格标注在瓷器之上，一方面能给买者很直观的感受，不用再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也是和国内其他窑场之间竞争的需要。如“富从升合起，贫从不计来 五文”“有钱水亦热，无钱火亦寒 五文”“人生一世，草生一秋 计伍文”“油瓶 伍文”等，可见“五文”是当时瓷壶的普遍定价。

此外，长沙窑还为其他产品代言，以“借船出海”的手法推销产品，其中以酒的广告最多，如“陈家美春酒”“国士饮”“好酒无深巷”“盛饮春酒”“浮花泛蚁”“奇绝好美春”“今春乏酒财”等。

长沙窑除广泛供应国内市场外，其显著特征就是大规模的外销，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出水的“黑石号”沉船即是明证。

“黑石号”沉船共计打捞6万多件唐代瓷器，其中长沙窑瓷器达5.6万余件，表明长沙窑瓷器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外销商品，与越窑、邢窑并驾齐驱成为瓷器外销的“三驾马车”。而且，长沙窑位处“三驾马车”的中心，质量顶级的越窑、邢窑则处于两翼。

长沙窑能够有如此成就，既取决于中唐以后造船业的兴盛及新的海上丝绸航线的开辟，更是其自身大胆创新和包容天下的结果。长沙窑以市场为导向，广泛吸收域外文化因素，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图案都力求让域外消费者心理认同，为推动唐代的海外贸易发展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潭州作为长沙窑瓷器产品交易集散地，成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在瓷器上画水墨，不乏异域人物形象

目前发现的长沙窑器物总数已超过10万件，涉及人们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产品种类突破了以往陶瓷格局中的单一性，据统计，器类涵盖茶具、酒具、文房用具、玩具、佛事用具及其他生活用品等。

从器型看，长沙窑的主要器形有碗、壶、罐、钵、洗、盘、碟、盂、盒、灯、枕、烛台、炉、砚滴、砚台、镇纸、茶碾、塑玩、造像等，共计70余种。长沙窑不仅器形种类多，而且其器形极富变化，仅壶一种就有20多种形式，这在中晚唐时期的陶瓷格局中当属唯一。长沙窑不仅生产人们常说的圆形器，还出现了花形、仿动物形和金银器造型，表现了其鲜明的时代风貌和民间特色。

从色彩看，长沙窑成功烧造出青釉、酱釉、白釉、绿釉、黑釉、红釉及窑变釉等种类丰富的色釉瓷器，并在单色釉的基础上创新出复合釉、双色釉和多色釉的装饰技法，打破了唐代早期瓷器生产“南青北白”的格局，形成以北方邢窑白瓷、南方越窑青瓷和长沙彩瓷的新的陶瓷局面，对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长沙窑彩釉有釉上彩和釉下彩等多种装饰技法。釉上彩多以乳浊白釉为底釉，再施以色釉烧制，釉彩易脱落。釉下彩则是在胎体上施彩釉后再罩青釉烧造，表面釉色清亮透明，底层釉彩鲜艳牢固。釉下彩分单彩和多彩两类，以点彩、块（斑）彩、条彩、线彩为表现形式，装饰内容以诗词书法、绘画为主。

长沙窑以釉下多彩工艺为基础，尤其注重借鉴中国书画的笔墨传统，以形写意，讲究韵律，形成了独特的装饰风格，开创了中国彩瓷文化的先河。长沙窑釉下彩绘画题材十分丰富，有花鸟、人物、山水等，在中国古代绘画史、工艺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花鸟画在长沙窑瓷器绘画中为数最多，成就最为突出。画工以简洁有力的线条，捕捉飞禽走兽的瞬间动态，表现花木水草的生机活力，画面或激情奔放，或闲逸恬淡，呈现出一幅幅自然灵动的生活画面。

山水画题材以水波、云气、树木、花草为主，构图简洁，虚实结合，画法自然，画面饱含情趣和诗意。写意画以白釉绿彩的表现形式居多，利用釉色浸润而产生抽象的效果。笔触率意挥洒，釉色自然漫晕，具有点、线组成且虚实相生的美感。

人物画数量不多，但特色鲜明。画面线条圆润而有力，切合唐代工笔人物画“铁线游丝”“吴带当风”的技法特点。长沙窑人物画中不乏异域人物的形象，这是唐代长沙与海外贸易交往密切的明证。

宗教题材画的表现对象有莲花、佛塔、庐舍、菩提树、贝叶棕榈等，线条或繁或简，意境深邃。其中部分产品是为开拓海外市场、迎合异域文化风情而生产的，反映了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作者系长沙市博物馆副馆长）

唐诗与唐史

病树前头万木春：诗人的性格决定命运

归来的只有刘禹锡

柳宗元《江雪》诗意图，明代宋旭绘。

□ 吴 鹏

唐顺宗李诵即位后，支持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人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大唐中兴呈现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美好前景。但顺宗的健康状况和改革集团的内部矛盾，却导致这场改革成为大唐中兴历史进程中的“沉舟”“病树”。

永贞革新：颜色如花命如叶

贞元十九年（803），当时还是太子的李诵有次和僚属讨论朝政，表示要劝父皇停废民愤极大的宫市。东宫官员“皆称赞”，唯有出身社会底层、经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的王叔文“无言”，李诵颇感怪异。

众臣散去后，太子问他何故不言。王叔文言道，殿下您目前的唯一职责就是孝养陛下，不宜过问朝政。陛下年事已高，如果怀疑您收揽人心要抢班夺权，您何以自解？且此时宦官已经在皇位继承上有发言权，如果太子触犯主导宫市的宦官的利益，会有接班无望之虞。太子听罢“大惊”，涕泣言道“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王叔文由此得到太子“大爱幸”，与另一宠臣王伾一起成为太子心腹。

王叔文观察朝中百官，为太子挑选班底。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韩泰、程异等青年，急于施展抱负，先后与王叔文“定为死友”，其中尤以柳宗元、刘禹锡为甚。

柳宗元与刘禹锡，二人年龄相仿，只差一岁，都出自中低级官员家庭，早年饱经战乱流离，关心同情普通百姓。贞元九年（793），柳宗元、刘禹锡同年考中进士，经吏部铨选后步入仕途，经常与其他青年士人讨论朝政得失，意图在太子登基后整顿朝纲。

永贞元年（805），顺宗即位。王叔文、王伾集团迅速接管朝政，二月十一任命韦执谊为宰相。王叔文居中决策，王伾沟通四方，韦执谊主持前朝事务，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各司其职。

改革集团首先以反腐为突破口，将横征暴敛的京兆尹李实贬到通州（今四川达州一带）当刺史，赢得民心；将百姓拖欠朝廷的皇粮国税一笔勾销，谢绝各地进奉，废除宫市、五坊小儿等贞元弊政。三月，将陆贽等被德宗贬黜的贤臣请回朝廷；五月，任命范希朝为神策军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准备夺取宦官兵权。

几项措施下来，贞元年间弊政一扫而空，史称“永贞革新”。但是，王叔文等人过于急躁，自视过高，自诩为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且心胸狭窄，将韩愈等倾向改革、只是不属于他们集团的大臣都排斥在外。

韩愈曾作诗《永贞行》，“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诗中“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等语，即是指王叔文只提拔本集团内部士人，失去大多数朝臣支持；而“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语，则是指王伾贪污纳贿，家里甚至专门打造一个存放金银绸缎的大柜。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改革集团所依赖的顺宗半身不遂，不能有效掌控朝政。掌握禁军实权的宦官俱文珍等人，反对范希朝、韩泰统率神策军；掌握地方实权的剑南节度使韦皋等人因扩大权力的要求一再被革新派压制，都和王叔文有矛盾，多次上表要求顺宗传位给太子李纯。

永贞元年（805）六月，王叔文因政见不合与韦执谊发生激烈冲突，后在俱文珍的威逼下被迫辞职。韦执谊不但不承担起整合改革力量的重任，反而拒绝王叔文的任何建议。王叔文去职后，王伾进退失据，多方奔走试图起复王叔文为宰相并统领禁军。一番努力无果后，王伾明白大势已去，一日在翰林院值班时忽然佯装发疯，大叫“伾中风矣”，被人抬回家中，从此闭门不出。

八月，顺宗在俱文珍的反复施压下，被迫退位为太上皇，命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宪宗将革新集团成员全部贬为地方各州司马，王伾在贬地病死。第二年正月，46岁的顺宗驾崩，宪宗赐死王叔文。永贞革新以王叔文、王伾为首，中坚力量刘禹锡、柳宗元等8人均被贬为司马，故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失败后，白居易作《陵园妾》诗，用为先皇守陵的宫女喻指“二王八司马”，表达了对革新派的深度同情——“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宪宗在贬黜“二王八司马”时，曾明确下旨即使全国大赦也不能赦免革新派，故白居易在诗中有“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之语。

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刘禹锡“我言秋日胜春朝”

刘禹锡贬任朗州（今湖南常德一带）司马后没有消沉，仍然保持激越向上的斗志，曾在一年秋天登高远望秋色，写下《秋词二首》，其一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相比于乐观豁达的刘禹锡，贬谪永州（今湖南永州一带）的柳宗元性格比较忧郁敏感，他在《渔翁》一诗中写道：“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渔翁在山青水绿之中自遣自歌，独来独往，颇似贬谪孤寂的诗人自身。

在《江雪》中，柳宗元更是用隐居山水之间的渔翁，寄托清高孤傲的情感，抒发政治上的失意苦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宪宗元和十年（815）初，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已经“十年不量移”。执政大臣怜诸人之才，欲渐次提拔进用，将他们召至京师。刘禹锡回京后，有次在长安道观玄都观赏桃花，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禹锡借桃花嘲讽那些在这10年中成长起来的新贵，不过是在自己被排挤出去之后才得以提拔，而那些看花之人无非是趋炎附势之徒。

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讥讽，深深刺痛了新贵们。回京不到三月，在新贵的诋毁下，宪宗任命柳宗元为柳州（今广西柳州一带）刺史、刘禹锡为连州（今广东连州一带）刺史、韩泰为漳州（今福建漳州一带）刺史、韩晔为汀州（今福建长汀一带）刺史、陈谏为封州（今广东封开一带）刺史。五人官职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任职之地更加偏远，实为贬黜。

柳宗元、刘禹锡同出长安南下，走到湖南衡阳时分别，一去广东，一去广西，各奔东西。二人临别各写三首赠别酬唱诗，柳宗元先提笔写下《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劝刘禹锡莫要再意气用事，作出看花戏君子之事。

刘禹锡虚心接受柳宗元劝告，深情写下《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迁客骚人同立荒郊，翘首仰望北回大雁，思乡之情传达得极为凄婉。两人马上要各奔东西，只有山水相望。夕阳古道，风烟漫漫，前程茫茫。

从贞元九年（793）同榜进士，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到22年后风云变幻，再贬远荒，更让他们感到凄凉的不是个人遭难，而是朝廷弊政依旧，无力回天。柳宗元最担忧的不是已经遭受打击的当下，而是二人不知何时才能重聚的未来。

元和十年（815），柳宗元42岁，刘禹锡43岁，虽逾不惑，却也尚是壮年。刘禹锡遂写下《答柳子厚》劝慰：“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会待休车骑，相随出尉罗。”他劝柳宗元：虽然我们比“四愁多”的东汉张衡更加郁郁不得志，但更应效仿春秋遽伯玉在六十高龄仍能与日俱新。

柳宗元的忧郁，刘禹锡的达观，两人的性格差异深度影响到再次贬谪后的心境，以致多年后只有刘郎独自踏上北归之路。

刘禹锡归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元和十年（815）五月十一，刘禹锡到达连州。稍晚后的六月二十七，柳宗元抵达柳州，迫不及待登上城楼，只为遥望同被远贬的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写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元和十四年（819），宪宗成就文治武功，大赦天下，裴度趁机劝宪宗召柳宗元回京。只可惜柳宗元多年抑郁，重病在身，无法上路。这年十一月初八，年仅47岁的柳宗元在悲愤交加中于柳州郁郁而终，终究未能返乡。

同年，刘禹锡扶母亲灵柩回洛阳，十一月路过当年同柳宗元分别的衡阳时，惊闻柳宗元去世噩耗，“惊号大叫，如得狂病”，悲痛中写下《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千里江蒿春，故人今不见”。

宪宗去世、穆宗即位后，刘禹锡改任他州刺史。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奉调回洛阳东都尚书省任职，与从苏州刺史任上同返洛阳的好友白居易在扬州相逢，置宴把酒，白居易写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赠予刘禹锡：“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刘禹锡写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回赠白居易：“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从顺宗永贞元年（805），到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先后贬任湖南、广东、重庆、安徽等地。23年间，柳宗元等老友渐次离去，世事变迁，人事全非，恍如隔世。刘禹锡用病树、沉舟况喻自身，虽有惆怅之意，更具达观之心。“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面朝新局，他重添精神，再迎春光。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三月，刘禹锡调回长安，此时距他元和十年（815）作诗“戏赠看花诸君子”已经14年。刘禹锡重游玄都观，见观内“荡然无复一树”，遂再题《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桃花已经荡然无存，元和时期的新贵们也已经树倒猢狲散，只有我刘郎硬硬朗朗地又回来了！此诗分明是有意旧事重提，对权贵的轻蔑嘲笑，对未来的乐观不屈，尽在这28字之中。

回长安后，性情旷达的刘禹锡仕途相对顺畅，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出任正三品的礼部尚书，后因病赴洛阳任同是正三品的太子宾客，虽未能拜相执政，但所任职务多是品级较高的闲职，亦乐得逍遥，与同居洛阳的白居易“酬复颇多”。会昌二年（842）七月，刘禹锡病逝，终年71岁，葬于荥阳（今河南郑州西部）。

当年宪宗虽严厉处置了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派，但并未否定革新，而是顺势举起革新大旗，革新已经成为朝野上下共识。沉舟侧畔，千帆竞发而过；病树前头，万木葱茏而春。一场轰轰烈烈且脚踏实地的革新运动即将发起，助推大唐走向安史之乱后的真正中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著有《选贤——<资治通鉴>中的用人得失》《大唐二十一帝》等）

河南郑州刘禹锡墓。